主编:杨桂青　编辑:韩晓萌　设计:王保英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715　邮箱:hanxiaomeng226@126.com

国际视野

“鲁班工坊”打造合作办学新名片

张清玲

自2016年3月8日在泰国建立首个“鲁班工坊”起，到2020年11月13日马来西亚“鲁班工坊”正式揭牌成立，我国已在全球17个国家建成了18个“鲁班工坊”。“鲁班工坊”既是一种中外合作办学的新模式，也是对外教育援助的新方式。

在泰国大城技术学院“鲁班工坊”铁院中心，来自泰国北部一所职业学院的学生阿提雅（右）与同学一起演示中国高速铁路列车CRH380B型动车组模拟驾驶控制台的操作方法。　新华社记者　杨舟　摄

1 职业教育“走出去”成为中外合作新桥梁

“鲁班工坊”响应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以鲁班‘大国工匠’形象为依托，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和服务我国企业‘走出去’，搭建起与世界职业教育和海外企业对话与合作的新窗口和新桥梁。“鲁班工坊”由天津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发起，重点面向东盟、非洲和欧洲国家、中巴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基于当地经济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输出我国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和教学模式以及企业产能和服务，培养既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又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

近年来，“鲁班工坊”规模不断扩大，遍布在亚非欧三大洲的17个国家，包括亚洲的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和马来西亚，欧洲的英国和葡萄牙，非洲的吉布提、肯尼亚、南非、马里、尼日利亚、埃及、乌干达、科特迪瓦和马达加斯加。

2 政校企共同搭平台，有效保障“鲁班工坊”可持续发展

“鲁班工坊”建设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优质职业院校的积极配合。根据合作创建主体的不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发展模式。

学校合作创建模式。即我国职业院校根据自身的专业优势，选择国外合适且优质的院校合作创建“鲁班工坊”。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准确对接合作院校的人才培养需求，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和储备本土化高素质人才。例如，泰国的“鲁班工坊”是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和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城技术学院合作创建的。

校企合作创建模式。即我国职业院校与在海外办厂的企业或承揽海外工程项目的企业携手合作，遴选境外优质职业院校合作创设“鲁班工坊”。该模式通过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一方面致力于培育当地企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解决当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推动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培养当地熟悉中国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技术技能人才。例如印度的“鲁班工坊”是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和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中国昇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天津市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中国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等5家在印度的中资企业与印度金奈理工学院合作建立的。

依托政府间战略合作创建模式。即基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的合作文件，借助政府的战略合作政策来建立“鲁班工坊”。该模式谋求长远合作和共同发展，发挥“鲁班工坊”作为我国与海外经济和人文交流机制的最大效用。例如柬埔寨的“鲁班工坊”是在澜湄合作框架的推动和支持下，由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与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合作建设的。

依托院校与教育管理部门合作创建模式。即我国职业院校与国外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合作创设“鲁班工坊”。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区域内的各种优质教育资源，还可以获得海外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支持力量，有助于实现区域内的学分转换和互认以及与职业教育学历体系的有效接轨。例如巴基斯坦的“鲁班工坊”是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技术教育与职业培训局合作建设的。

“政校企”协同共建模式。即在政府间的战略合作政策、院校间的国际合作以及围绕企业需求的校企合作基础上，由政府、企业和院校三方协同创办。这有助于充分发挥政府顶层设计的主导力量、企业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的主体作用以及院校连接政府与企业的媒介作用，有效保证“鲁班工坊”的目标实现和可持续发展。例如吉布提的“鲁班工坊”是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吉布提教育部、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吉布提工商学校和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协作共建的。

3 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服务我国企业和当地经济发展

“鲁班工坊”从启动到现在仅仅5年时间，但其建设成效已初步显现，影响广泛且深远。

专业领域日益扩大。基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对各式各样人才的需求，“鲁班工坊”开发和建设了种类繁多的专业课程，不断满足当地人才技能提升的需求。例如，早在2019年，已经建成的11个‘鲁班工坊’就已经开设了自动化、工业机器人、云计算、新能源、铁道、动车组检修、汽车、机械、电子信息、通信、餐饮、物联网等12大类28个专业。此外，‘鲁班工坊’还提供系列化的配套教学资源，既有相应的中外文教材，也有网络课件和视频等信息化教学资源。据统计，中外文双语的专业教材有90部，相关专业课程多达79门。

为海外中国企业提供人才人力支撑。“鲁班工坊”协助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一些重大项目，如已建成通车的蒙内铁路、亚吉铁路项目，正在建设的匈塞铁路、中泰铁路和中老铁路项目等。“鲁班工坊”为这些重大项目培养了一批可用的技术技能人才。

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和培训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例如，2017年12月印度‘鲁班工坊’与当地5家企业签署了培育企业急需人才协议，至2018年5月就已经培训了200名在校生、75名数控技术与维修人员。2018年，巴基斯坦‘鲁班工坊’与当地8家企业签订了产教协同育人联盟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培养当地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泰国的‘鲁班工坊’不但为泰国师生提供职业技术培训，同时还向东盟各国职业院校师生开放。截至2019年，到泰国‘鲁班工坊’交流学习的东盟学生达7000余人次。

人才培养成效得到认可。经过“鲁班工坊”的专业培训，学生的技术技能水平大幅提升。例如，经过“鲁班工坊”培训，泰国学生8次获得泰国国家技能大赛金牌，并为泰国首次赢得东盟技能大赛一等奖；从“鲁班工坊”毕业的泰国学生就业率达到100%；“鲁班工坊”所在的大城技术学院荣获了泰国王室最高奖项“国王奖”。马来西亚和印尼学生在泰国“鲁班工坊”学习和训练后，也获得了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国家技能大赛一等奖。英国“鲁班工坊”开设的“中餐烹饪技术”学历教育已被纳入英国国家资历框架，课程得到英国政府财政大力支持，可供16—19岁的英国及欧盟学生免费学习。

“鲁班工坊”建设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发展还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我们需要不断提升“鲁班工坊”的建设内涵，创新发展模式，开发配套教学资源，完善建设标准和评价制度，保障“鲁班工坊”健康发展，使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现代职业教育国际品牌。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热点探究

疫情下国际学校何去何从

王炜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引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动荡，严重冲击国际教育交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我们既要将目光投向世界，直面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又要坚定自信、保持定力，努力做到内外统筹、提质增效、主动引领、有序开放。

无论是教育的决策者，还是教育的参与者，都在寻求尽快摆脱当前困境，探索疫情之下国际人才培养、加强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实现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路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兴起的国际学校（具有国际化办学特色的中小学），因其融合中西文化、汇聚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培养“行走于世界的国际化人才”等特征，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视野。

国际学校的“冷”与“热”

中国的国际学校主要分为三类：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开设的国际课程项目。我们这里谈的主要是后两者。

2020年，国际疫情形势严峻，留学热降温。据了解，受疫情影响，去年各类国际教育择校展普遍比较冷清，参与群体以幼儿园、小学阶段的低龄孩子家长为主，原计划让孩子出国读大学的高中学生家长减少。媒体调查发现，各地多所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国际课程项目招生遇冷。以南京为例，当地公办学校、民办高中国际课程项目招生缺额达到181人，部分项目出现断档。从招生遇冷来看，疫情对留学选择影响很大。

与此同时，国际学校规模还在不断增长。根据国际教育调研机构“新学说”统计，截至2020年10月，全国范围内各类全日制国际学校共有1399所，其中获得权威认证的学校共907所，与2019年同期相比新增46所。在国际学校中，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国际课程项目占据近90%的份额。2020年，国际学校在校生规模为61万人，其中民办学校占比75%。总体来说，2020年中国的国际学校在数量上仍然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同时，部分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还在扩招，如北京新增了4所公办学校国际课程项目进行招生。从这一情况来看，出国留学依然是一部分家长和学生的未来选择。

国际学生的“去”和“留”

部分计划出国留学的学生因入境限制、部分国家政策收紧及安全考虑等原因，选择推迟或放弃出国申请。教育部为缓解疫情导致的出国留学受阻问题，推动了94个中外合作举办的大学、机构和项目临时扩招，中外合作办学成为留学替代选择。学生实现了不出国门的在地“留学”。

疫情暴发致使很多滞留在外国的中国小留学生被迫停课停学，出于安全和未来考虑，多数家长想尽办法将他们接回国内。小留学生回流到国内，就学选择成为家长们首要关注的问题。低龄学生家长择校观念在发生变化。先在国内学习，等疫情过去再出国留学，在这种“曲线留学”的观念下，家长为了保证孩子在国内享有良好的双语和跨文化氛围，倾向于将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就读。

国际教育的“变”与“不变”

在‘停课不停学’政策之下，国际学校积极开展在线教育教学，多转为线上或OMO教学（Online-Merge-Offline），即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总体而言，线下教学是国际学校的优势所在，转为在线学习后，国际学校的教育成效并不明显。

疫情也给国际学校对外交流带来诸多影响。校园开放受到限制，原定的研学、夏令营等活动暂停，一些国际学校开启了‘云访学’。国际学校与国外学校的师生互派、交流访问大幅减少，转为线上远程交流方式。“双轨制’办学也成为国际学校的一个有益探索，即采用以国家课程为基础的‘融合式’教育体系。国际学校继续发挥中外办学优势与特长，为学生提供国内和国外两个出口的升学选择。

总体而言，疫情改变了人们对国际教育的理解，给国际化办学和教育国际化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国际学校应更加积极地与国内高校、公办学校开展交流合作，积极探索转型升级和科学发展之道。

（作者单位系中国人民大学）

办学之道

高校境外办学要高质量谋划

廖菁菁

高校境外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有力证明，是我国高校向世界展现实力的一种全新方式，同时也是我国高校加强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教育国际合作的新路径。新时代，高校如何走得出、留得住、办得好，成为急需探讨的问题。

高校境外办学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试行）（2019年版）》。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这些文件完善了高校境外办学的政策法规，推动了高校境外办学规范有序发展。从地方来看，安徽省、江苏省等一些省份率先出台政策松绑举措，例如，出台了一系列较为灵活宽松的出入境签证规定等。这些举措切实解决了高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公出国严审和高校扩大对外交流交往之间的矛盾，在保障地方高校境外办学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十三五”期间，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稳步发展。一方面，高教境外办学数量增长。数据显示，我国高校在近50个国家举办了100多个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从办学目的国（地区）来看，以亚洲为主，覆盖美洲、欧洲、非洲等区域。从高校性质来看，涵盖“双一流”高校、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从办学模式来说，主要以项目模式为主，占62.50%；教学点模式占到32.03%；分校校园模式占到5.47%。从学历层次来说，主要以本科层次、研究生层次为主，兼有专科层次、非学历教育等。

另一方面，高校境外办学质量显著提升。长期以来，境外办学的专业集中在汉语教学及中医教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其他学科专业也越来越受到目的国（地区）的欢迎。例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2018年共开设15个本科专业，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申报的5个专业获得了赞比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局的审批通过。可以说，高校境外办学取得显著成果。

我国高校境外办学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项对我国高校境外办学情况的摸底调查表明，一部分境外办学机构（项目）因故中断，高校境外办学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以公办高校为主的办学主体在财务与资产管理方面需要突破。现有的国有资产采购和管理相关规定给资金使用带来一些限制，影响了高校境外办学条件的完善。

其次，教学资源有待丰富，办学模式要从被动型转为主动型，从不稳定走向稳定。由于师资不足、运行资金缺乏、高校境外办学能力不足，一些高校选择与其他机构合作的方式办学。此外，投入比例存在差异，影响了我国高校的管理权，我国高校的自主权有待进一步增强。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对教学质量控制不够，还会影响我国高校的国际声誉与发展。

再次，相关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虽然我国政府积极尝试政策上的突破，教育部等多部门也携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在事业单位资产出境管理、派出人员出国手续管理、学生学籍管理、质量保障管理、信息共享管理等方面，高校境外办学仍然存在一些难题。

“十四五”期间我国高校境外办学建议

主动应对挑战，推进我国高校境外办学更快、更稳、更高水平发展，可在四个方面进行探索。

实施“政府项目制”，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高校境外办学是一项境外投资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财力资源是影响高校境外办学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主体基本上都是公办高校，在事业单位资产不能出境的政策规定以及可使用资金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一些问题暂时难以解决。虽然政府鼓励民办高校积极参与境外办学，但由于我国民办高校在境外教育市场并没有较强的优势和吸引力，目前来说，这不是解决财力问题的有效方法。因此，建议实施“政府项目制”，以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

建立资源共享管理系统。针对师资派出不足等问题，建议采取“高校联盟”的方式，由母体高校进行统筹，向国内兄弟院校或者境外合作高校发出协调优秀师资的请求，形成多方派遣教师的局面。这有助于解决师资派出难题，保证境外办学教学质量，维护我国高等教育的声誉。针对办学目的国信息获取渠道少、成本高、滞后等难题，建议搭建畅通的“境外办学法律事务咨询平台”“境外办学国别信息数据库”“境外办学专家数据库”“境外办学外派教师数据库”“政府多部门联动管理信息平台”等，形成支持和推动境外办学的信息资源合力。

选择存在天然互补性和互惠性的合作机构。合作机构的匹配度是决定高校境外办学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选择合作机构时，建议慎重考量高校与境外资源之间是否存在天然的互补性和互惠性；考量亲近关系程度，主要表现在地域上的邻近和历史上的合作基础等；考量是否存在共生关系，即能否形成牢固稳定关系。高校要通过互补，超过自身限制获得更多新收益，实现“1+1>2”的效应。

构建“四级管理主体”的质量保障体系。质量保障是高校境外办学发展的核心问题，决定了跨境高等教育的成效和声誉。建议构建境外办学质量保障“四级管理主体”体系，即教育主管部门、第三方教学质量评估机构、境外办学高校、外派教师等四个层面的参与主体。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是在考量其他国家的教学质量审核标准及国际上统一的教学质量标准（例如国际工程教育标准等）基础上，制定本国境外办学质量标准或行业标准。第三方教学质量评估机构的职责是掌握其他国家和国际上的教学质量标准，与政府部门保持对接，制定符合境外教学质量需求的本国教学质量标准，以指导高校开展境外教学活动，保障境外办学机构（项目）的教学质量。境外办学高校的职责是根据政府部门制定的境外办学质量标准或行业标准，制定本校具体的指标和实施办法。外派教师的职责是根据学校制定的指标，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做到“自查、自省、自改”，实现自我评估和自我监督。

（作者单位系贵州师范大学）